

虞舜故乡在余姚

诸焕灿

舜——有虞氏姚舜，名重华，世称虞舜，是中华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部落大联盟的著名首领，他继唐尧而承酋长（帝位），成为上古五帝之一。

由于记载上古史实的档案文献奇缺，而对上古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却特别丰富，史实和神话往往夹杂在一起；更由于不少地区出于对古人的怀念而取有众多相同的地名，建有众多的古人遗迹，从而对上古史实有着多样的说法，遮盖着层层迷雾，历代的考索也带有较多的臆测性与牵强附会性。这在对虞舜出生故里的考索上也同样存在。虞舜，作为上古五帝之一的中华民族先祖，对于他的出生地却一直未有定论，四千多年以来一直未能为他落实一个确切的故里。时至今日，尚在各说其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疑点，难以为世所公认。

最早记载虞舜事迹的是《尚书》中的《尧典》与《舜典》，尤其是《舜典》，是专门记载虞舜言行的专文，两文中载有虞舜娶尧二女及外出巡狩地点，却均不及虞舜出生之地。只有在《孟子·离娄章句》中才明确地记载：“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①汉代的赵岐在此句下作注说：“诸冯地名也。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②有了“诸冯”的地名，但“诸冯”究竟在何地，仍无确指。然而，赵岐在这些注中告诉了一个重要的方位信息：“诸冯”是在东方夷服之地，又靠近海边的区所。那么，什么叫夷服之地呢？按方位来说，即“东夷”、“北狄”、“西羌”、“南蛮”，范文澜先生曾比较正确地概括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③远古时代，把天子所住的王畿以外地区，按每五百

里为一区划，自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共划分作九等区域。自蛮服至藩服均属荒外之地。《周礼·职方氏》中对“夷”解释说：“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④《礼记·王制》中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⑤这说明，“夷”是远离中原王畿的东方民族，是属于尚未开化的荒蛮民族的泛称。按《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东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⑥也就是从辽东省一直往南，至浙东吴越的滨海土著民族均概称为“东夷”。其中也包括如山东滨海夷族中的本由中原迁来的外来移民。但在这众多的“东夷”族之中同虞舜相关的只有浙东吴越境内的“夷”，因为只有吴越境内有虞舜的遗迹可查，并有古文献作依据。况且吴越正处在三千五百里之外的披发文身的东夷范围之内，又是紧临钱塘湾的滨海之地。至于山东境内的“夷”，据已故著名考古家李白凤先生考证，山东夷族中的鱼族（姜姓，本是黄帝族遗裔，迁入山东后成为一个相当强盛的民族，居住在“伯禽封鲁”的鲁地），鳧族、莱夷的鳧族、徐夷的虎族，均是原住中原地区，后被来自西方的羌族打退到东方，才散居于山东及淮河流域的。⑦且在这几种夷族中绝无与虞舜相关的记载，同虞舜的出生没有干系，不在此文论述范围。

按文献所载，亦为学界所争议的。虞舜的出生地有三：冀州蒲坂、濮州雷泽、越州余姚。现就这三处予以论述之。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冀州的地理位置。冀州，即今山西省及河南的北部和河北的西北部，是当时的天下九州之中心。按《史记正义》在“冀州”之下注中，更具体地说成是本属冀州的蒲州河东县，即蒲坂城（现山西永济县东南），又说蒲坂有“舜厘降二女于妫汭”⑨的妫水。我们从地图可以看到，蒲坂（永济县）地处山西省的最西南角，隔黄河与陕

西省大荔县相望，应该属当时的王畿区域，与东夷荒服之区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看来，司马迁同写《史记正义》的张守节，混淆了故里和建都的区别。据《尚书·尧典·舜典》及其他古文献载，虞舜都于蒲坂，娶于妫汭，崩于苍梧，葬于九疑，都是极为清楚的，仅缺出生之处的明确地名而已。《史记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⑩《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平阳，今晋州城是也；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板故城是也。”⑪《水经注》说：“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⑫这里说得很明白，蒲坂是舜所都之地，并非是出生之处。蒲州所有之舜的遗迹，只是舜继尧位之后所遗存而已。司马迁却把虞舜建都的蒲坂（冀州）当作虞舜故里，实属大谬。按《史记》本是具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史书典范，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史记》往往喜以传说入史，有自相矛盾或不实之笔，如清代著名考证训诂学家王鸣盛就曾引《史通》作者唐代刘知几的话说：“子长（司马迁）与经传抵牾处诚多。”⑬《史记》说“舜，冀州之人也。”实是司马迁的误笔，不可为据。

依据上文所引《孟子》，我们已经知道虞舜出生于东夷诸冯。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下引各条：

《竹书纪年》曰：“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⑭

《括地志》引《孝经援神契》中说：“舜生于姚墟。”⑮

《史记正义》引晋代周处的《风土记》说：“舜东夷之人，生姚丘。”《风土记》还说：“耕于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作为析，故曰历山。”《史记正义》又引《括地志》说：“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⑯

《史记索隐》引皇甫谧的话曰：“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⑰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

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⑮《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說：“越州余姚縣，舜姓姚，故云余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⑯

清初的許三禮在《歷代都邑考》中說：“舜，諸馮人。”⑰

就上引資料可以知道：姚墟即是姚丘，舜生于姚墟可成定論，聯起來即是：東夷諸馮姚墟。同時，在上述引文中已多次指明姚墟同余姚的關係，現暫且將此擱起，下文再作詳述，先來看一下《括地志》一書中的另一種說法。

《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題魏王李泰（唐太宗第四子）撰，實成于蕭德言等多人之手，寫成于唐貞觀十六年，是一部征引廣博，極有參考價值的著名地理著作。此書至南宋後已散佚過半，而在唐人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中卻大量引用了此書原文。在與虞舜生地相關的條目中，《正義》引《括地志》說：“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接着又說：“越州余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妫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⑱這裡提到的“妫州”即為冀州蒲坂的妫水，是虞舜建都之所，非東夷之地，上文已經說明。留下的問題，就是濮州的姚墟同余姚的姚墟二者取一。現在我們仍來看一下濮州雷澤縣的地理位置。

濮州，今為山東鄆城縣，雷澤縣在鄆城之南，與荷澤縣交界處，漢代于此置成陽縣，至隋開皇十六年又改置雷澤縣，因境內有雷夏澤而名，屬濮州。雷夏澤今已淤。查地圖可知，濮州（鄆城縣）在山東省的最西境，緊領黃河，同河南濮陽縣隔岸相對。按直線距離測量，濮州距最近的海邊黃海西邊的海州灣有近 800 里之遙。與《孟子》所載負海的東夷明顯不合。

按虞舜與雷澤之關係，亦起因于《史記·五帝本紀》中“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⑲”之句。依照司馬遷的行文筆意，句中的歷山、雷澤、河濱、壽

丘、负夏几地仅仅是虞舜成年之后躬耕、渔鱼、制陶、迁居之所而已。司马迁是把虞舜当作冀州之人的，不会在前后紧接的文句中又会自相矛盾地点出一连串地名作为出生地的。后世之好事者，又仅依据“雷泽”两字，不对“渔”字作细考，随意强为牵合，把现属山东西境的濮州雷夏泽误作虞舜的出生之地了。或许司马迁所说的历山、雷泽，可能是冀州境内的两处地名，而非濮州的雷夏泽。

另外，濮州本属兖州，最靠近冀州，距尧舜时代的王畿中心亦仅 900 里之远，应属第二等的甸服之地，不属于东夷。在黄河改道前，可能还应归属于河南的杞族。且，大家都知道东岳泰山，是远古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的礼仪名山，曾作为华夏的象征，但泰山尚在濮州之东 300 里，即是说濮州比泰山更接近王畿。于此，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濮州应属最接近中原的礼仪之邦，并非披发文身的荒蛮夷服地区，况且离海边太遥远，与《孟子》所说的“东夷之人”明显不符。不可能属于“被发文身”，吃生食的夷服之地。“被发文身”之地只能是远处夷服的吴越《史记·吴太伯世家》载：“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自号句吴。”②③《史记索隐》说：“荆者，楚之旧号；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以此推断，《孟子》所说“东夷”之“诸冯”，只能在吴越之境内。濮州雷泽县同冀州蒲坂均非靠近海边的东夷之地，均非虞舜出生之故里。

剩下的问题就是余姚同姚墟的关系了。为使证据不过于单薄，再摘录下列引文：

按成书于晋代的《会稽旧记》载：“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②④这里所指的“虞”，是指浙江上虞旧县城（丰惠镇）。距上虞三十里即已是余姚县境。

查北宋时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余姚县条说：“《风土记》云：‘舜生于姚丘，妫水之汭。’姚丘山在县西北六十里。”②⑤

宋《嘉泰会稽志·山·余姚县》条中亦载：“……姚丘山在县西

北六十里。旧经云舜母握登感虹生舜之地。又引周处《风土记》以为证。《三朝国史》云余姚县有姚丘山。虞山在县西三十里，旧经尝引《太康地志》云舜避丹朱于此。……历山在县西北八十里，旧经云在会稽东南，昔舜耕所也。……王介甫《历山赋》序云：‘余姚县人与季父争田，予为直之，将归闵然，望历山而赋之。历山在上虞界中。’案此山实属余姚，介甫谓在上虞界中，误矣！”^{②6}

宋《元丰九域志·两浙路》亦载：“余姚，有姚丘山、罗壁山，余姚江。”^{②7}

《雍正浙江通志·山川·余姚县》亦载：“姚丘山在县西北六十里，舜余族所封。”^{②8}

从上述引文证明，余姚有姚墟，有姚丘山，同虞舜的出生极有干系。另外，余姚还有一条流经东西的大江——姚江。姚江同姚丘山二者均为冀州和濮州两处所无。

姚江，又称姚水，发源于太平山，流经上虞县至余姚城，往东直泻甬江，即因流域内之姚墟而得名。《雍正浙江通志·山川·余姚县》转引《名胜志》载：“姚江在县南十步许，又名舜江，”^{②9}余姚在上古时亦单称为“姚”，舜因生于姚墟而姓姚，正是上古之人取姓之通例。姚江流入余姚南北两城之间的一段江面又别称舜江，即因虞舜而得名。

“姚水”之名在《五帝系》中已有记载。《五帝系》原书已佚，司马迁写《史记》时此书尚存，因此《五帝本纪》多采用此书文字。姚江之北即有《风土记》所载的姚丘山，西去即入上虞县境。姚丘山的东南方有历山，历山之北即紧靠钱塘海湾（杭州湾）。历山上有舜井，亢旱不竭，据《康熙余姚县志》载：“历山在县北四十里，有象田、舜井、石床诸迹……山阳石壁镌‘耕隐’二字，有石嵌空横覆如床，可坐数人，相传为帝舜耕时避雨处。”^{③0}《余姚六仓志》亦载：“舜帝庙在历山。”注曰：“殿中祀舜帝，以明躬耕之古迹。有‘圣德重华’匾额。”又引宋代林景熙诗曰：“老断薰弦万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尧衣剥

落星辰古，野庙凄凉鹿豕秋。孝友风微唯古井，神明冑冷尚荒丘。
九疑回首孤云远，老眼斑斑楚竹愁。”^⑪

历山之西有诸家、冯家，旧称诸冯废墟。光绪《余姚县志·典祀》载：“舜帝庙在云柯乡历山。”^⑫万历《余姚县志·疆域》中也说：“极西曰舜桥，《寰宇记》及《太康地记》云‘余姚有舜桥，舜避丹朱于此。’”^⑬在上虞县东北靠近余姚西北处亦有冯家山、舜井、象囚山。象是舜弟，傲顽不肖，曾被舜所囚。有仇亭，舜避丹朱于此地。邻县嵊县亦有舜皇山，有舜庙、舜井。宋·王楙《野客丛书》历来以考辨文献精审详明而见称于世，他对余姚历山也曾考辨说：“历山有四，而余姚之历山不列其间。然自汉以来，余姚上虞之名县皆以大舜，彼四历山之所无，此一证也；舜禹同时，禹之迹在会稽，人所不疑，舜之迹在会稽乃独疑之乎，此又一证也；虞氏子孙盛于姚江者数千，彼四历山未闻有显者，此又一证也。合此三证，则历山之在余姚者为是。”^⑭

又，“帝舜为有虞氏”，《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舜嬖于虞，因以为氏。”^⑮而虞氏又是余姚之郡姓，宗族繁隆，虞翻、虞预、虞喜、虞世南等虞姓著名学人即余姚产，官宦特盛，亦不为无故。

按《元和郡县图志》所说：“余姚县，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曰余姚。”^⑯这是将本末倒置了。实应是舜因地名而得姓，并非是因舜姓而后取作地名。又《万历绍兴府志》认为：“少康封少子无余于会稽，姚乃其属邑，故曰余姚。”^⑰这也错了。按《山海经·南山经》载：“句余之山，无草本，多金玉。”晋·郭璞注：“今在会稽余姚县南，句章县北，故此二县因此为名。”^⑱郡县之名往往以山川之名来命名，这是常理。以余姚境内之句余山名及姚水姚墟之名而命县名为“余姚”，这才是余姚取名的真正由来，与无余之封会稽毫无干涉。

大禹作为一位在东南水环境中产生的英雄，后由于虞舜的举用，成为中原汉族第一个王朝的开国君王，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而

曾“荐禹于天为嗣”^⑨的虞舜，亦完全可以出生在东南滨海的余姚江边的姚墟。对此，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也曾在绍兴、上虞、余姚之地躬行调查，查实有舜故迹多处。陈教授由此亦认为虞舜出生于于此。

对于余姚与虞舜的关系问题，著名学者、史学家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也有一段话：“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才曰姚江，亦曰舜江。其水之经上虞者曰百官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虹漾，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故《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此皆与孟子之言相合。顾野王云‘余姚，舜后支庶所封之地，’是乃附会《史记》，而后人反信以为实。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上虞，故曰‘东夷之人’。”^⑩看来，梨洲先生也是确认舜出生在余姚上虞之间的。

综上所述，余姚上虞两地与舜相关之地名遗迹可谓多矣，又有别处所无的姚丘山，北临苍海，又属东方夷服之地，无怪乎历代不少学者如梨洲先生等要确认“舜之生在余姚，故曰‘东夷之人’”了。

1973年，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即有河姆渡人生活在余姚境内，并创造了古代文明。河姆渡文化遗址位处姚江岸边，这亦可说明姚江游域为东夷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虞舜，作为东夷之人，说他出生在姚江游域的余姚姚墟的诸冯，是依据实地考察，并结合古文献考证的结果，并非臆测。根据上述所引，大致可见端倪，即舜生于东夷之诸冯（姚墟），耕于历山，后迁居到负夏（卫地），继尧之位后都于蒲板，最后卒于鸣条，葬于九嶷。

对于虞舜究竟是什么地方人，争论了二、三千年，至今尚无定论。由于上古文献资料的缺乏，要想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看来是

有一定难度的。笔者只想以所见文献资料，参核余姚当地山川遗迹，初步认为，舜出生在余姚的姚墟，余姚是虞舜的故里。在1988年笔者曾撰文提出过《舜生于余姚浅议》，现再在原文的基础上充实能够见到的资料，进一步予以论证之。不妥疏陋之处，尚望专门家斧正。（作者单位 余姚市乡贤研究会）

注：

①②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孟子》。旧有“诸冯”即山东诸城县的说法、大误。

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④《十三经注疏·周礼》

⑤《十三经注疏·礼制》

⑥《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⑦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版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⑳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四。清徐文靖在《竹书纪年统笺》中曾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

㉑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

㉒浙江书局汇刻本《二十二子·竹书纪年》卷二

㉓清·许三礼《历代郡邑考》

㉔《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

㉕《太平寰宇记》

㉖宋《嘉泰会稽志》清嘉庆刻本

㉗宋《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

㉘清雍正《浙江通志》

㉙①②③转引自《光绪余姚县志》

㉚杨积芳《余姚六仓志》

㉛宋·王楙《野客丛书》

㉜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

㉝浙江书局汇刻本《二十二子·山海经·南山经》卷一

㉞《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㉟《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1985年版

虞舜与余姚

张放鸣

中国历史上，朝代自夏禹始，之后为商，再后为周，史称三代（或称三王），争议几无。但三代以上，则纷纭众说，莫衷一是。不过，大多都归纳出五帝，五帝之中，排在末位的通常都是虞舜。这说明，关于舜的文字记载，已明显与神话传说拉开了距离，而接近于寻常人家之生活插曲以及英雄人物之传奇故事。有鉴于此，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舜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关于舜之故里的证实，就不再是子虚乌有的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使一些有识之士，重新考虑到：余姚乃舜的故乡。联想肇始于“舜生于姚墟”一说。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研究员，更是不遗余力，力促余姚地方政府做好虞舜故里这篇大文章。此后不久，在余姚北城龙泉山东南麓新辟大门正中，史先生的“姚墟古迹”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便俨然镌刻于石碑之上。

笔者如我，十分赞同史树青先生独具只眼的看法，即五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曾经是非常有名的姚墟。可惜，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度灿烂繁荣的上古文化村址，过早地沦为了废墟，幸好她的赫赫声名，多多少少，还一直流传到了春秋战国年代；另一方面，中国历代文献，也颇见有关舜与余姚的文字记载，何况余姚至今仍流传有许多虞舜古迹。但联想与揣测，不能代替事实与结论，如果真要让人们相信，这是真的，还有待于严谨的分析与论证，然而那是困难的。在本文中，我们至多只能依据先秦文献中的蛛丝蚂迹，以及民间传说、考古成果、风土地貌等等，作一粗疏大略的罗致，以助于联想与揣测的合理性，充其量不过是聊备一格，如此而已。

一、姚墟姚水 姚姓有虞

中国人自古就有姓、氏、名、字(号)之分。先帝之姓大都从水：

黄帝成于姬水而姓姬，炎帝长于姜水而姓姜；所以舜帝因长于姚水而姓姚，也就非常顺理成章。姚水今称姚江，又称舜江、舜水；源出余姚西南太平山及菁山，东流至甬江入海。姚江成于何时，不得而知，推测大致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相去不远，距今约 5200—4700 年左右。舜降世之时，姚江已经形成，但河姆渡文化已成废墟，故称姚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遗址，恰恰是先民留下的废墟；而余姚之“余”，在古汉语中写作“餘”，意思是剩下的，引申为遗留、遗存，李白诗中有“城荒古迹余”。由此可知余姚之名，是姚墟遗存之意。姚江这名，想必也与之不无关系。姚江足谓不大，但一直远近闻之。北魏酈道元把姚江释为《夏书》中扬州三江之一：“江水又东，迳余姚县故城南，县城是吴将朱然所筑，南临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谓沧海浩浩，万里之渊也……江水又东注于海，是所谓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水经注·卷二十九》）姚墟与姚水合称二姚。《离骚》中有，“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乃大禹后裔，曾封少子无余于越，以留守会稽之禹冢。姚水、姚丘，想当时曾经是非常有名气的，故史树青先生称余姚地望深厚。《天问》中，屈原云：“舜闵在家，父何以鯀？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当尧听了来自姚墟姚水的人们有关舜的种种美德的报道后，便断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给当时还只是布衣的虞舜。

氏的本义，应与氏族部落有关，正如先帝的姓，多半与一方水土有关，而氏便是暗示着事功成就与氏族特征，同时也兼有行家里手之意：“氏，犹家也。”（梁玉绳《史记志疑》）譬如，炎帝称神农氏，意谓“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淮南子·修务训》）；黄帝称轩辕氏，意谓“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轩辕氏”（《汉律历志》）。另外，构木为巢被称为有巢氏，钻木取火被称为燧人氏，庖厨杀宰被称为庖牺氏。舜姚姓而有虞氏，故对有虞氏的合理解释，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有，乃大有，即大丰收。（见《周易》卦十四）有，

在古文字中，从手而持月，月乃刺田工具、耒耜之类；令人想起有虞氏所独有的“舜耕历山”之说法。上古时江南土地已十分肥沃，出产丰富，有河姆渡遗址作证；有稻谷丰收，才有储米仓廩，才有舜涂廩之故事；而仓廩实则知礼节，所以才有舜大孝之美谈。“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说的正是此意。而虞之“虞”，唯一涉及事功方面的解释，便是“古代掌管山泽的人”，如《史记》中，“益主虞，山泽辟”。恰恰也只有江南一带的山泽，才值得一管，同时也只有谙熟大山深水的人，才委以“虞”任。《史记·五帝本纪》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说文》解释道，“舜入山林之官，勤于职事，虽风雨而不误。”正因为舜从小就在面南山泽躬耕渔猎，所以才能“纳于大麓，烈风于而适”（《尚书·舜典》）。相反，舜若生长于中土冀州，便不可思议，因大禹水治之前，冀州正处“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吕览·审为篇》云：“昔上古龙门未辟，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野，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可见，其时中土，还只是一片不毛之地，舜之都于蒲坂，那是为尧起用且水治告成以后，故许多记载都曾强调：舜一徙成聚，二徙成邑，三徙成都。

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其实，从文学艺术的风格中，人们也不难辨别出地域色彩，尤其是南北差异。中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都与山青水秀的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率真、空灵而又浪漫的情调，得益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大好山河。从流传下来不多的几首与舜有关的文艺作品来看，便是透露了舜与东南古土间的血肉联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祝盟》中，清晰地载有舜“耕于历山”时的悠然情调：“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已有专家认定：与北方旱地之“锄耕农业”相对应的，正是南方水田之“耜耕农业”；而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骨耜中稻谷，恰好又表明了余

姚乃“耜耕农业”的最早发源地。又，《吴越春秋》保存下来的上古诗歌《弹歌》，一开口就反映出鲜明的南方特征，其诗云：“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淮南子》谓：东南之美者，有会稽竹箭。《史记》中，舜之能以两笠死里逃生的记载，想来也只有在多竹之东南一带才成。上古诗歌中，另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击壤歌》如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活脱脱如河姆渡先民之生活情景的生动写照；在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内，人们发现有一口为我国最早的木构水井。较早记下这首诗歌者，正是与余姚毗邻的上虞人王充，他在《论衡》一书中，至少两次记下此诗。《老子》中那段关于上古之时“小国寡民”的记述，同样也与之不无关系。这些记述，显然只能发生在南方；理由很简单，当尧之时与之前，中原一带，“十日并出”，“洪水振天”，居处条件十分恶劣，是不可能有此番太平景象的。况《庄子·让王》中：“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毛皮，夏日衣葛布。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书·禹贡》中所称扬州（古越州）“岛夷卉服”，“岛夷”即东南沿海居民，而“卉服”正是“葛布”之谓，也解作“斗笠、蓑衣”。《淮南子》云：“匈奴出毳裘，于越生葛布。”

舜又有一首特别钟爱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韩诗外传》、《史记·乐书》、《尸子》等，均有“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一说。《正义》释《南风》是“孝子之诗”：“南风养育万物，故孝子之歌也。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史记·乐书》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所以，舜虽迁于负夏，都于蒲坂，贵为天子，仍不忘故乡历山父老，不免频频回首江南。这种“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的心态，晋时复见于舜的相去历山不足卅里的上虞老乡嵇康；嵇康所著《琴赋》之灵思，想必也得益于舜。《礼记·乐记》云：“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江南至今仍流传有“江南丝竹”。东南越地山好水好，钟灵毓

秀，所以越女洁白秀美，越歌委婉细腻，都不是没有来由的，这在舜时其舞曲《韶》中，便已见尽善尽美。《论语》中，“子谓《韶》，‘尽美矣，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显然，无外美之山水，便无内秀之先民也；《安庆府志》云，“吴越多秀民”，“秀民”才唱得出“丽歌”。公元前6世纪流传的《越人歌》，便是这种委婉柔美的典型之作。诚然，大楚也在江南，故楚辞之缠绵悱恻，亦非无因。

长歌当哭，这在东南沿海的农村地区，一直盛行不衰。人到伤心处，边歌边哭的风俗，同样也滥觞于舜时。《书·大禹谟》：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颜氏家训·风操篇》云：‘礼以哭有言者为号。’此处号泣，正是且言且泣。舜微为庶人时，常遭父母兄弟的陷害，伤心至极，便伫立田野，向苍天哭诉自己的不幸。号泣进而又演变为歌哭。《吴越春秋》记述了这一方式的沿革：“越夫人哭而歌之曰：‘……心缀缀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无独有偶，邑人王阳明在那篇别具肺腑的散文《瘞旅文》中，也以同样的方式，对素昧平生的天涯逐客，“嗟吁涕泣而告之曰”，继而又“吾为尔歌，尔听之”。其实，越剧中最哀婉动人的曲调，便是源自民间的歌哭；笔者幼时曾亲历这种民间歌哭的场景，其印象之深至今不能磨灭。

三、东南神州 鸾凤和鸣

关于舜与东南古土间的联系，我们还可以从文献记载中，那些有关舜时的衣食住行、风俗人情，再参照河姆渡遗址所呈现的文明，来探寻其飘渺的踪影；虽然仅仅是一些蛛丝蚂迹，却常常透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消息。

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舜与黑齿究竟是怎么回事。《竹书纪年》云：“帝舜……龙颜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此大口内之黑色，正是黑齿之谓。《山海经·大荒东经》里曾提及：“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帝俊即帝舜。《礼记》谓：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而《史记·赵世家》云：“夫剪发纹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

却冠秫紬，大吴之国也。”比司马迁记载还早，则有《管子·小匡篇》：“南至吴越——雕题黑齿。”可见这种习俗，在春秋吴越时，尚还流行。所谓黑齿，《史记集解》刘逵曰：“以草染齿，用白作黑。”又，《淮南子·坠形训》在谈及“自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时，汉高诱注曰：“其人黑齿，食稻啖蛇。”这里已明确告诉说：黑齿民食稻。再让我们重温一下《汉书·地理志》：“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畜宜鸟兽，谷宜稻。”而“河内曰冀州……谷宜黍稷。”这就进一步表明：黑齿民食稻，在东南会稽一带。顺便一提，东南沿海居民的平均身高，与北方人相比，总要矮一等，想必也与食稻有关。故有的文献称“舜身短”，因为与其他先帝比，舜要短一到三尺；如尧为七尺二寸，而禹则有九尺九寸。

另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戡处，是谓巫戡民，巫戡民盼姓。食谷。不织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不织不经而服，作注者认为是“自然有布帛也”，且特意点出，《夏书》云：“岛夷卉服，此其义也。”岛夷即东南沿海，卉服即吴越特产葛布。《吴越春秋》中，越王勾践，曾向吴王夫差贡献布帛无数。从这段记载里，我们还可看出，舜与越先民鸟图腾之间的联系：“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论衡·书虚篇》）；“越王为人长颈鸟喙”（《论衡·骨相篇》）；“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为”（《越绝书》）等等。越国将亡时，越主夫人随勾践赴吴，哭而歌曰：“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羞兮矫翼。”令人想起舜的一个传说：“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廩，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竹书纪年》）。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昇日”象牙雕刻，更被认为是鸟崇拜的有力证据。双鸟是否可以理解为鸾与凤，成语“鸾凤和鸣”，想必正是“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之意。《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尚书·舜典》所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

正是舜时歌舞盛况。河姆渡遗址中，有陶埙及可以模仿鸟鸣的骨哨，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又，《礼记·明堂》谓：“鸾车，有虞氏之路也。”李白梦入浙江剡溪，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其中有诗句“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礼记》一书，保存了大量上古先帝的轶事和习俗，除了“有虞氏鸾车”、“有虞氏米廩”，还记有“有虞氏瓦棺”（《礼记·檀弓》）《淮南子·汜论训》中，也载有“有虞氏用瓦棺”，并有高诱注曰：“瓦棺，陶瓦。”很难说这只是巧合，此前早些时候，《宁波日报》曾有报道：河姆渡遗址新出土两千余件文物，其中瓮罐葬和夹碳红衣陶为首次发现。瓮罐葬，据称是河姆渡先民特殊的丧葬习俗。这种习俗，将人的尸体用火烧烤后，再把遗骨放进陶瓦罐内，而后再入土安葬。此为古代“火葬”之雏形。虞舜所用瓦棺，大概与此类似，不然真若烧成比人还大的陶瓦棺材，也是匪夷所思的。

龙山文化期，黄河中下游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诗·绵》云：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周易》所谓“上古穴居而野处”，指的正是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因地处低洼，土质“涂泥”，根本无法穴居，因而只能巢居，至少也得架空着住。《礼记·礼运》有：“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此处所谓先王，应是唐尧以前。其时东南，河姆渡先民早已经发明了干栏式建筑。舜迁居冀州后，把东南文明带到中土，所以《淮南子·诠言训》谓：“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陈忠来先生所著《河姆渡文化探原》中提出：“商周时期流行的一些重要青铜器，如釜、鼎、豆、杯等，在半坡遗址没有发现，反而在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海边上的河姆渡遗址中找到了它们的祖型。”这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很有可能是由东南传向西北的，而始作俑者，又不能不令人想到虞舜。早在三十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就著文：《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7期）。实际上，这一争论早在先秦，就已经开始了。王充在其论著《论衡·难岁篇》中，对上古九

州之中心，便分述了儒者、周公、邹衍的不同观点。而阴阳家邹衍所持的观点，正是卫聚贤先生所坚持的立场：“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洛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南位，名曰赤县神州。”（《论衡·难岁篇》）。另外，《淮南子·坠形训》也有相类似的说法：“何为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足见上古时东南就曾被称之为神州，而非史书所称“蛮荒之地”。

四、渔于雷泽，陶于河滨

说到舜的早年经历，太史公在《史记》中，有一段影响深远的简述，大意如下：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此说较早见自《吕氏春秋》以及《墨子·尚贤》。关于“舜耕历山”，人们谈论较多，大概与距余姚县城五六十里开外，确乎存在一个历山有关。北宋王安石路经余姚历山时，曾“闵然望历山而赋之”：“历山之峨峨兮，予汝耕之，孰汝强之？”直到不久前，那儿还有学校叫“舜耕小学”的。

舜既生于姚墟，长于姚水，耕于历山，那么其所渔之泽，一定相去不远。就如山东濮县、山西永济均有“历山”一样，所谓的“雷泽”也如影随形。山东濮县东南接菏泽县界，有汉时成阳故城，晋时称城阳，至隋方更名雷泽县。《书·禹贡》谓：“雷夏既泽”，《孔传》云：雷夏，泽名。显然，这是后人为附会“舜渔于雷泽”，而简称之“雷泽”。而山西永济县之雷泽，在县南四十五里雷首山下，其水南流而入黄河，它的本名原是雷水；一望而知，此乃好事者因水有雷名，强为牵合。其实，最早确指雷泽的典籍，为《山海经》；不仅确称“雷泽”，还确指方位“海内东”：“雷泽……在吴西。”（《山海经·海内东经》）且“海内东经”之区域中，另有一条“会稽山在大楚南”，可相与参证。吴西之雷泽，即今浙北之太湖，先秦文献里，也常称太湖作具区、震泽。《周易》中，震为八卦之一，解为雷。舜渔于雷泽，即